



毛泽东的话风文风

□ 陈 晋

阎明复还对毛泽东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却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心迹，在他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彻底的宣示。他还曾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易懂，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地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自传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践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个体会，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摘自2015年第6期《党的文献》，原标题为《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与话风文风》）

忆往事

在武乡的一次精神洗礼

□ 杨 珏

翻开中国抗战史，山西武乡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的地方。从太原出发，乘坐刚刚开通的郑太高铁南行40多分钟便到达。时间太短，已经打开的思绪闸门还来不及关闭，看着晋东南的春天一片蓄势待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位于太行山西麓的这方革命圣地究竟创造了怎样的历史？不必说八路军近10万将士在此长期战斗，也不必说长乐战斗、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等对日作战6368次，只看八路军总部曾5次转战于此驻留长达536天，就足以不负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踏上这片热土，双脚总是不知如何安放。

这是一片“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的土地，当时全县仅有的13.5万人中就有9万余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2万余人牺牲。站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时时处处都能感到烈士英魂犹存，心中充满虔诚与敬意。

（一）

下车第一站，总是选择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每次走进纪念馆都会不自觉地整理衣衫，一件件遗留文物、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幕幕战斗复原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脚步越发沉重起来。

总是不经意间停留在一双草鞋前，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只是每一次都想再听一遍，再感受一次伟大的抗战精神。这双草鞋，是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772团团长叶成焕牺牲时穿着的鞋子，那一年他才24岁。

1938年的春天，抗战烽火燃遍太行。在遭受八路军几次打击之后，日军集结大量兵力分9路向太行根据地发起围剿。772团接到命令向武乡一带集结，叶成焕正患肺病，有几次严重地咳出血来。听说旅长陈赓要送他去后方治病，叶成焕急了：“没事，我已经习惯了，还是让我打了这一仗再说吧！”

在叶成焕的带领下，772团上下一心、奋勇作战，给刚进入武乡长乐滩的日军辎重部队迎头重击。然而，队伍还未来得及打扫战场，日军3000多人的支援部队又再次逼近，战场形势千钧一发。

面对战友们一遍遍提醒，他仍然站着没动，“你们先走，我随后就下去。”突然，日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叶成焕倒在了血泊之中。“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战士们终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受伤严重的他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哎，队伍，队伍呢？”这是大家听到他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句话，牺牲时他的脚上就穿着这双破旧的草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消息传来，时任师长的刘伯承号啕大哭、悲痛万分。那段岁月里，像叶成焕这样的革命先烈不胜枚举，正是他们，用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吹响了中国必胜的号角。

（二）

走出纪念馆，不远处就是八路军雄风碑林公园，由孙毅将军题写的园名遒劲豪壮。党和国家领导人、八路军将领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写下的饱含深情的文字，书写着一代人的怀念，也是后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是朱德总司令在武乡奋笔写下的壮丽诗篇，诗词写就的不只是革命者的乐观主义，更彰显了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1939年的冬天，太行山上，寒风凛冽，白雪飘飞。八路军战士一边面对着日军的“蚕食”和“扫荡”，一边面对着供给断绝。英勇不屈的八路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吃着黑豆煮野菜，鏖战在冰天雪地中。

默读这首诗，想着悬崖峭壁上修建的黄崖洞兵工厂，那是一种怎样的气概，感叹今天美好生活之余，总会涌起敬仰感激之情。那个时代的困难，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在那种环境中，八路军战士硬是靠自力更生，活下来、站起来、强起来。

面对根据地物资严重匮乏的现状，太行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高潮。仅一年时间，129师就种地10万亩，其中开垦荒地8万多亩；在漳河两岸修筑了十几条大堤，开出1万多亩滩地，修筑了20多里长的漳北大渠和漳南大渠，实现了吃饭全部自给。在根据地广泛动员下，兴起了大量的纺织厂、服装厂等，根据地的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

王家裕八路军总部旧址外，有朱德总司令当年植下的一株白杨。1940年春天，他亲手将珍藏许久的一颗红星帽徽深埋于树苗根下。白杨长大后，沿着树枝断面出现了一个清晰的红色“五星”图案，像极了五星帽徽。当地人说，这是当年朱德总司令埋在树根下的那颗红星长在了树干中。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却饱含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如今，在这棵“红星杨”周围又长出了许多新的“红星杨”，就像抗战精神不会在时光中泯灭，只会传承中愈发闪耀。

（三）

走出碑林公园，沿石阶而上，便是八路军抗战纪念碑。

长长的石阶，好像在告诉人们曾经的抗战之路是那样漫长与艰辛；耸立的丰碑，像是在展示八路军战士宁折不弯的伟岸身躯；19.37米的高度，更是让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那个特殊的年份。

周建屏、段士增、杨万林、宣侠父、刘连科、陈宇寰、洪麟阁、金道松……728位血洒疆场的八路军正团级以上干部英名录，镌刻于纪念碑浮雕背面。

一个值得缅怀的名字，就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728位先烈代表的是40多万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八路军战士。“人来不可高声语，恐扰英雄山上眠。”此时能做的唯有在心中默默地向长眠于历史深处的英雄们致敬。

再往上走便是徐向前元帅纪念亭，在他的戎马一生中，曾辗转跋涉过许多座大山。山中的战斗岁月凝聚成了他的大山情结，让他为之梦萦魂牵。人生弥留之际，徐向前元帅留下3条遗嘱：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最后一条就是死后将骨灰撒到大巴山、大别山、太行山……

三条遗嘱，诠释的是老一辈革命家无私奉献、纯粹信仰的一生。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险隘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家突敌胆寒……”恍惚间，一位谦逊隐忍、俭朴刚毅的布衣元帅浮现眼前。站在山上，向下望去，便可俯瞰老区风貌，偶有南风吹来，红旗猎猎、松涛阵阵。清澈的漳河水碧波荡漾、奔流不息；不远处的“复兴号”进站又出发，平稳急速地驶向远方。一切都显得那样安静祥和，曾经的历史正在渐渐远去。

走出纪念馆，心中难免有一丝失落与惆怅。忽逢一对年轻恋人迎面而来，他们正谈论着抗战的故事。略显稚嫩的声音中，听出了崇敬与坚定，女孩眼角闪着隐隐泪光。心中一下释然，原来记忆从未磨灭，那安静之下涌动的是不灭的精神火焰和不屈的民族意志。

“我们会好好爱护你浴血守卫的山河”，八路军文化园广场上书写的一行大字拂去了我步履间最后的沉重。

武乡，我在此又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摘自2021年第4期《党建》，原标题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上接1版）

（二）

用系统观念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推动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指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拓展深化。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力量调整组合，新旧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正在进行深刻演变；从内部环境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区间进入到中高速增长区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但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和趋势没有变，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首先是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期面临着从“追赶者”到“弄潮儿”的角色转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普遍重创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当下，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为改革创新创造了“时间窗口”。

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工作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要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牢固树立系统观念，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锚定远景目标、谋划推动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强化顶层设计，左右协同、上下联动，形成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协同机制。可以说，越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越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系统观念的

（上接1版）

（二）

重要性就越发突显。

坚持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谋划发展，就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两个循环，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历史和现实、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等关系，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新进与突破相衔接，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用系统观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大制度优势。需要运用系统观念，推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从“立框架、建制度”向提升体系化能力、增强体制应变能力转变，建立“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国家科技组织模式，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三）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崇高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价值诉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立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实践证明，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有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才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并依靠人民战

胜一切艰难险阻。在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还是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人民立场、一如既往的赤子情怀、一以贯之的价值坚守。用以人民为中心锚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价值旨归，就能使经济发展既有“为了人民”的价值指向，又有“依靠人民”的深厚动力，最终通过“人民共享”契合和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不断提升，倒逼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适配性的提升。要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效转化为人民群众更多更切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实现人民利益，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紧紧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十四五”时期，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行为都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要求我们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最大范围地凝聚人民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力量，尊重其意愿、保障其权利，尊重首创精神、鼓励创新发展，使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充分共享。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能够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具有显著的政治优势、协同优势、价值优势和战略优势，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遵义会议会址确认记

□ 黄 娟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坐落着一幢青瓦灰砖砌就的两层小楼，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遵义会议会址。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和认定会址颇费周折，用了4年时间。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专员公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员着手寻找和确认会址。

当时，一些群众回忆说，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可能是遵义会议开会的会址。随后，经筹委会初步认定，“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被挂了上去。

这个由法国传教士兴建于1867年的天主教堂，真的是大家要寻找的会址吗？

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会址弄错了？

有关部门赶紧将“柏公馆”的照片、地图等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其加以鉴定。

1954年8月，杨尚昆同志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一线索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说法相互印证。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费侃如介绍，1954年11月，经文化部批复，原本设在“柏公馆”里面的遵义地区公安处搬走，“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挂到了“柏公馆”的正门上。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备，开始对内部开放。直至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过二楼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同志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会址出来，邓小平同志一行又来到遵义天主堂。他们发现，这里实际上是当年的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摘自202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